

貴州辛亥人物傳稿

刘毅翔 著

贵州省社科规划研究课题

贵州人民出版社

香林先生文集

貴州辛亥人物傳稿

刘毅翔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辛亥人物传稿/刘毅翔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8

ISBN7—221—06292—7

I. 贵... II. 刘... III. ①政治家—列传—贵州省—近代②辛亥革命—史学—贵州省 IV. K827.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867 号

贵州辛亥人物传稿

著 作 人:刘毅翔

责任编辑:龚 璐

书名题字:陈付中

封面设计:陈 华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 × 1168mm 1/32

字 数:407 千字

印 张:16.25 印张

版 次: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6292—7/K·728

定 价:50.00 元

总 目

总目	(1)
史者，实也——代前言	(3)
凡例	(13)
人物分类目录	(15)
姓名笔画索引	(19)
传记正文	(25)
附录	(481)
一、《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贵州会员）	(483)
二、1. 自治学社《社员姓名表》	(484)
2. 《自治学社第二次入社社员姓名表》	(485)
3. 《各府州县赞成自治主义诸君姓名表》	(487)
4. 《本社欢迎之报告》	(489)
三、《宪政预备会第一次会员名册》	(493)
后记	(518)

史者，实也

——代前言

(一)

《贵州辛亥人物传稿》正式出版，正值暑期，是学生毕业、结业的时间。作为编著者的我，已五十七八岁，按规定仅有两三年就该退休，离开我已从事二十五六年以上的专业历史研究工作岗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毕业”、“结业”（完结、结束工作事业）。

回顾起来，我与史学结缘，如果从1963年夏秋考入贵州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算起，那么，至今已有整整40个年头。之前，我在贵阳较有名气的一所重点中学——贵阳六中读高中，也曾受过良好的文史教育。语文老师是晚清进士、民国《贵州通志》继任总纂杨恩元（覃生）之子——杨石，历史老师是当时便常在省报发表文章、颇具才气的彭年炳。于是，报考大学时，我就将中文系填报为第一志愿，历史系为第二志愿，但学校选择了我的后者。好在当时我还不满18岁，是全班所有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可塑性还强。系上普遍进行安心专业思想教育，在1964年秋季系学生会主办的黑板报《东风》“迎接新同学”的专刊上，便选登了我稚嫩的一首诗：“我们的队伍在前进/踏着前人的足迹/寻找社会发展的秘密/探讨，学习/不知疲倦，永不停息……”

在贵州大学历史系，姚公书、曾昭毅、张振珮、杜文铎、吴廷栋、李祖唐、陈造福、李雪华、严士琦、侯绍庄、林振草等老师的谆谆教诲，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业后，我曾到军队农场锻炼，到工厂、中学工作，与所学专业结合不甚紧密。从1975年开始，我就自己利用业余时间钻研贵州地方史及中国近代史，经常在

遵义市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等处，同故纸堆、线装书一起度过节假日；并主动请教杜文铎老师，成了杜文铎老师的私传弟子。

1978年夏，我撰写了论文《浅谈夜郎二三事》，被邀请参加了贵州省首次古夜郎学术研讨会，并成为首批会员。1979年初，我考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学习，正式开始了我这一生的专业历史研究工作。

1979年是中国全面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头一年。史学界进行着大量的“拨乱反正”，针对“文革”中歪曲、伪造历史，大搞“影射史学”的歪风，正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提倡注重史料的辨伪和史实的考证。这年《中国史研究》第一期特意发表了著名史学家陈垣在辅仁大学讲授“史源学实习”课时，为其学生写作的范文《治史遗简及晋长沙王×卒年考》，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大家学习。全国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也特别强调要学习著名史学前辈范文澜“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谨严学风。在这种氛围中，我较系统、全面地学习了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史学史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苦练史料、理论、文字等从事史学研究必备的基本功。这年6月，研究生班要求历史专业学生每人写一篇读书心得，作为对其科研能力的摸底、考核。我根据自己的积累，仿效陈垣的范文，写了一篇读史札记《“南绍寇陷太原”置疑》（发表时更名《明史纪事本末一勘》）。这篇史料考证论文，当即因获得负责教师赞赏而被同学探问、借阅。虽然这篇短文成文时不长，所用史料不多，但我在研究过程中寻找、查阅、考证过的相关史料，却多达30余种，约4、50万字，基本做到了“厚积薄发，博观约取”。我将该文寄给国家级《历史研究》，该杂志1980年第5期也很快予以刊用发表。这对我潜心治史，既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和鞭策，同时，又对我立志养成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和态度，产生了莫大的信心。清代著名史家章学诚曾说，要成为“良史”，“札记之功，必不可少”（《文史通义·外篇三》）。我作为史学战线的新兵，居然机缘巧合地契合了中国传统史

家的治史之道，真是万幸。

1980年，研究生班学习结束，我正式成为贵州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首先承担的集体课题是西南军阀暨贵州军阀史研究。1981年是与民国初年军阀史相连的辛亥革命运动70周年，全国及贵州史学界都纷纷隆重召开纪念会与学术研讨会。我为参加这种辛亥革命史研究十年一遇的盛会而准备论文时，有幸查阅到了贵州辛亥革命中主要政治团体“自治学社”所办刊物《自治学社杂志》第一、二、三期。根据其所载“社纲”、“社章”和“社员姓名表”等原始资料，我发现自治学社并不像过去相关史书所说的那样，是所谓“同盟会贵州分会”，从开始创立就是所谓“革命派”组织。于是，我便撰写了长达一万三、四千字的论文《略论贵州自治学社与同盟会贵州分会》，在贵州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言宣讲，但却遭到一些“长者”、“尊者”的反对与驳斥，甚而扣以“自由化”等政治帽子。不过，他们的反驳主要是以势压人，并没有什么有力的依据，因此，不能让我信服。我坚信当时学术界及科研工作普遍倡导的一个信条：即“不唯上、不唯亲、不唯书、仅唯实”。中国史学自古便有秉笔直书、直笔实录的优良传统。唐代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说过：“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如亟去其位。”况且，韩愈、柳宗元都说过：“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见《韩昌黎文集·文外集上卷》和《柳河东全集》卷三十一）中国史家遭祸是屡见不鲜的事。我这时所遭受的压力，根本不能与春秋时期齐太史兄弟数人因为写了“崔杼弑其君”便被杀头的情况相比，因此，更应该为坚持真理，坚持史学的真实性，坚持史学的实事求是与创新而抗争：

——我把该文送交因事外出而未与会的贵州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贵阳师院（后更名“贵州师大”）吴雁南教授。数日后便得到吴教授亲笔函复：“文章富有创新精神，这是很好的。”“你的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正是许多人所缺少的，而这却是中国史学的一种好的传统。实事求是和创见，是我们目前所应坚持的研究作风。”“我的看法，自治学社在很长一个阶段是个立宪爱国组织，不久当

可为多数人所接受；在辛亥革命前夕，它是否有所转化，这一问题也很值得探讨……”吴教授的函复，对我是一种及时、有力的鼓励和支持，令我终身难忘。

——我把该论文同时寄给长沙湖南师院（后更名“湖南师大”）著名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史专家林增平教授暨正在筹备的全国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数日后也得到该会筹备组函复：破例专门给我一个名额，邀请我与会。但我却因单位领导不同意而受阻。贵州推荐赴该会共三位同志，仅有吴雁南教授的研究生张艮平因撰写了一篇内容、看法基本同我一致的论文，获得了三等奖。这对我来说，同样是一种鼓励。

——我把论文又寄给全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心、湖北武汉华中师院（后更名“华中师大”）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主办、北京中华书局出版《辛亥革命史丛刊》。数月后，又得到该刊函复，决定在其第六辑正式刊载我的这篇研究贵州辛亥革命史的处女作。

1986年5月，《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六辑面世，我的论文被发表在较前位置。1987年职称评定时，因为有了这篇论文和其他一些论文，并合作编撰了专著《贵州风物志》、《贵州军阀史》及《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等书，我被评为副研究员——当时，在我的大学同学和同龄人中，我算为数不多较早获得这一职称的。

（二）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制度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专制而开始走向民主共和的起点和重大历史界碑。在这场划时代的伟大革命运动中，贵州是继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等省之后，较早起义、光复、建立省级军政府、摆脱清朝皇帝专制统治的省份之一。毫无疑问，真正弄清楚辛亥革命在贵州酝酿、发生和结束的情况，真正弄清楚辛亥革命前后贵州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发展、变革的情况，这对于全国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肯定是有意义的和必须的。可是，迄今为止关于贵州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和论

述却存在许多缺陷和误区，主要表现为：1. 原始资料，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贵州整个社会方方面面发展、变革情况的原始资料挖掘、利用不足；2. 对辛亥革命前后贵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结构及其利益关系等社会基本要素具体状况的考察、研究与分析、论述不够；3. 过分强调了自治学社对贵州辛亥革命的主导作用，而忽略了起义新军、陆小师生、同盟会、宪政预备会等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与合力；过分强调了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的分歧与争斗，而忽略了二者的同一性与联合（而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又恰巧是在大联合的情况下取得的）；把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在贵州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说成为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的两党斗争史，说成为自治学社一个组织兴衰存亡的“社史”、“痛史”，等等。

为了解决这些缺陷与误区问题，自从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后，我便决心变压力为动力，抱着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态度，开始抓紧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想方设法，认真搜集、调查贵州辛亥革命时期的各种相关原始资料。我曾到过北京、武汉、长沙、成都、重庆、昆明、南宁、广州，以及贵阳、遵义、安顺、都匀、兴义、毕节、铜仁等地图书馆、档案馆、乃至博物院、馆查阅、咨询；也曾跋山涉水，深入荒郊野岭和坟岗乱林，查考碑刻、遗迹、谱牒，寻访知情父老乡亲及贵州辛亥人物遗属……我较仔细地翻阅过、摘录过《民报》、《东方杂志》、《申报》、《大公报》、《民立报》、《民呼报》、《民主报》、《民吁日报》、《预备立宪公报》、《时务报》、《黔报》、《贵州公报》、《铎报》、《贵州官报》、《贵州教育官报》、《遵义白话报》、《贵州文献季刊》、《湖北官报》、《宪政白话报（湖北）》、《湖南地方自治白话报》、《湖南官报》、《吉林自治旬报》等数十种清末民初相关报刊；手抄、收集到了《贵州谘议局第一届会期议案》、《贵州宪政预备会会员名册》、《黔学之础》、《黔乱真相》、《贵州党争事略》、《贵州不缠足会条约》、《辛亥黔垣疏通贯城河浚身工程报告书》、《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总览》、《贵州审计分处文牘辑要》和《杨氏族谱·都督恭诚公

传》、《皇清诰封奉政大夫世袭云骑尉显考张公愚庵府君行述》、《先兄千夫生活纪要》、《陈少将崧甫先生事略》、《涛园集》、《匏斋诗集》、《北征札记》等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原始资料。

在商品经济大潮已冲进学术研究象牙塔的今天一些人眼里，我辛辛苦苦，劳民伤财，从广泛寻找、挖掘、收集原始资料做起的治学治史方法，似乎“太傻”、“太笨”、“太愚蠢”、“太过时”。因为这种治学治史方法，就像加工生产一个产品，要从地质人员跋山涉水探矿，矿工开山打井挖矿，冶炼工建炉点火炼矿，直至机械工操作加工为成品，需要经过繁杂的工序过程，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且见效慢，成果少，效益低。而现在评职称，比贡献，给荣誉，给奖励，发工资等，大都是看包装发表的铅字“成果”有多少，承担（或名“承包”）的课题有多少，获得的“荣誉证书”、“奖状”本本有多少，一切都已“量化”和“数字化”，鼓励的是“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与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钻故纸堆，“探矿”、“挖矿”，还不如用现成的材料重新组合、包装（乃至不惜用三等材料头等包装或假材料真包装），人云亦云，“炒冷饭”，用时间、精力去疏通搞好各种关系，玩弄权术、花招，摆“花架子”，作华而不实的文章，“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多争选票，多争课题，多获奖励……只要有“成果”，有“课题”就行，只要能换来“名”，换来“利”，换来“职称”，换来“荣誉”，换来“地位”就行，哪管它有无“学术”，有无“研究”，“有名无实”？！

面对这学术研究领域已出现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严酷现实，我确实不识时务，不合时宜，不是对手。早在学生时代，我便牢记了一位哲人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从治史开始，便知道史者实也，历史是过去存在的事实，史学是一门“实学”，是踏踏实实，实实在在的学问。只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信史、真史，才能提供准确、可靠的历史借鉴，才能总结出真实、可信的经验、教训和科学规律，才能真正经世致用。否则，就是“哈哈镜”、假规律，盲人指路，歪嘴和尚念经，只能制造混乱，增添障碍与麻烦。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

国家。史书早已汗牛充栋，治史者毕其一生精力，皆难尽读。如果为了一己私利、个人名利，便随意编造、拼装一些秽史、伪史、垃圾论文、垃圾著作、垃圾成果出来，那么，对于史学的发展，对于学术研究的繁荣，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反而会增添一些故弄玄虚、花枝招展、华而不实、似是而非的东西让别人去辨伪、考证和研究，浪费别人的大好时光。

汉代著名史家司马迁是中国良史典范。他“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隋书·经籍志》认为史官“必求博闻强记，疏通知远之士”。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提出良史有“三长”，即“识”、“学”、“才”，并倡导“深识之士”，要有“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的精神（《史通·辨职》）。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学术研究出现了一种“高谈性命，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由于科举利禄的诱导，“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针对这种时弊，明末清初著名史家顾炎武明确提出著书立说、学术研究应该“采铜于山”的“实学”思想。他认为，“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黑，而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日知录》）他的意思，就是说著书立说、研究学术应该像古人一样“采铜于山”，力求挖掘、运用原始资料或第一手材料，而不应该捣碎旧钱币以铸新钱币，滥用第二、三手资料，乃至以讹传讹的资料。

清代中期著名史家章学诚曾对中国传统史家和史学进行总结。他大力倡导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也”的精神，倡导“一家之学”、“独断之学”、“专家之学”，认为“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他说：“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黑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

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即“一家之言”、“专家之学”——笔者）之所以可贵也。”（《文史通义》）他针对当时史学界“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黜，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的弊端，认为衡量“良史”的标准，除了“才”、“学”、“识”三条外，还应该注重其“史德”。所谓“史德”，即“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而现代著名史家顾颉刚亦曾直截了当地针对史学界、学术界欺世盗名的歪风说：“不靠实学，而靠活动和其他关系得来的有名学者，也会像司马迁说的‘当时则荣，殁则已焉’。”（顾潮：《顾颉刚学记》）

（三）

参照中国历代传统史学名家的这些至理名言，我不仅没有放弃“探矿”、“挖矿”、“采铜于山”的老办法、“傻”办法；而且，还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规矩：没有自己独断见解的论文不作，没有自己专门研究的书不写，宁缺勿滥。按照这些老办法和规矩，1990年中国史学会为筹备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而面向全国公开征集论文时，我撰写了一篇题为《略论贵州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的万言长文，提出和论述了贵州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本是同宗兄弟，立宪始分两壁；贵州独立携手，煮豆燃萁何急”的新看法。我的这篇论文又幸运地被会议筹备组选中。1991年10月我应邀赴武汉与会时，遇到代表武汉方面具体负责主持、操办该会的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刘望龄教授。我问他：贵州德高望重，学识、地位均远在我之上，非我能望其项背的辛亥革命史专家，大有人在，为什么皆没有被邀请，而惟独仅有我一个出席？他说，此次盛会为了真正展示我国辛亥革命史研究最新成就与水平，坚持了“以文会友”的原则。除特邀嘉宾外，大凡与会者，论文都是经过中国史学会组织国内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在北京香山严格评

选的。贵州有人写信托他“照顾”，他也爱莫能助。会议间隙，在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广东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好友王杰同志又告诉我说：这次会议虽然在武汉召开，但主办权在北京中国史学会。湖北方面为了鼓励本省能有更多的论文和作者入选，对每一位入选者当即兑现发给奖金500元……我听了这些话，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滋味，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因为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时我特立独行的论文带给我的苦与乐、经验与教训，我依然记忆犹新。所以，我便对王杰好友说，你们在湖北可以因论文入选此次盛会而得到500元奖励，我回贵州后却不知会有什么结果。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回贵州后非但当年没有什么奖励，至1992年贵州第二次社科评奖时，我的这篇经过国家级专家集体选中的论文，在贵州却依旧落选。我尊敬的两位老师、贵州省史学会正、副会长吴雁南、杜文铎教授都为我鸣不平。12月9日，杜文铎教授亲笔写道：“刘毅翔同志的《论贵州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一文是我省参加1991年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惟一的一篇文章。该文资料丰富，内容充实，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们曾向史学会推荐参加社科成果评奖。但在史学会表决时，未获通过，请上级领导研究解决。”吴雁南教授亦亲笔写道：“……鉴于刘毅翔的文章是一篇有质量论著，民主投票在一定的情况下也会同实际情况有所出入，如果能够有一些补救措施则至善矣……”然而，两位教授的仗义执言也无济于事。愤懑、困惑之中，我便写下了一首打油诗：“学业如海恶浪多，师恩似船常覆没；执著十年沉冤底，呼问青天欲我何？”

之后，虽然在1997年贵州省第三次社科评奖时，我那篇第二次社科评奖落选的论文终于被评了三等奖，我申报的《贵州辛亥人物传稿》一书编写工作，也被列为了1997年度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但总的来说，我的工作条件和科研环境却江河日下，大不如前。我还经常受到无端诋毁、压制或排斥。我承担的《贵州辛亥人物传稿》一书，就是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主要靠原

先的积累而完成的。

衷心感谢贵州师大吴雁南（当时重病在榻上）、张祥光、贵州大学杜文铎、柳蕴琪、贵阳市志办何静梧、贵州社科院冯祖貽和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钧儒等同志对《贵州辛亥人物传稿》一书结题验收时给予的指导、好评与帮助。衷心感谢中国民主建国会贵州省正、副主委王录生、周发辉、贵州省政协主席王思齐、文史委员会王恒富、邓健等同志为《贵州辛亥人物传稿》一书原决定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形式公费出版所作的努力。衷心感谢贵州顺康肿瘤药物研究所所长王照友同志在《贵州辛亥人物传稿》一书最终由自费出版的情况下慷慨赞助了部分经费。

我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头，但却遭遇了太多的非难，太多的不幸，真可谓步履维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工作的年限更加短暂。我遗憾的是，对贵州辛亥革命史拨乱反正的研究，我的计划是那么的庞大，有那么多艰难困苦的工作要做，而我个人却是那么渺小，我的力量又是那么微薄，迄今我还算不上完成了沧海一粟！我将本书定名为“稿”，目的是增大容量，用一种半成品的形式，包含更多资料性的、尚待继续研究的内容，以便后来者的取舍——这就如同未完工的大厦在已建成部分预留有毛头、接头一样。我将我的理念、追求、经历、遭遇、感受等和盘托出，目的是便于后来者参考、借鉴，少走我崎岖、曲折、艰难的路。

再过两三年，我这叶学海苦舟就将停靠码头。就像小说《红楼梦》一样，无论“假作真时真亦假”，还是“无为有处有还无”，我的“学海梦”也将唱《好了歌》。而一切恩恩怨怨，都将有个结果；一切是非曲直，则由世人评说！

刘毅翔

2003年7月于寒舍陋室

凡 例

一、本书紧扣“贵州”与“辛亥”两词四个字，编写了212人传记。既包含在贵州省内参与、支持或反对辛亥革命的各种不同政治派别重要人物，又包含在省外参与、支持、或反对辛亥革命的主要贵州籍人物，还包含入黔夺取贵州辛亥革命政权的滇军首要人物。

二、人物编排，总体分为十类：1. 同盟会及关联人物；2. 历史研究会、黄汉公及关联人物；3. 自治学社及关联人物；4. 宪友会及关联人物；5. 宪政实进会及关联人物；6. 政学崇实会及关联人物；7. 宪政预备会及关联人物；8. 耆老会及关联人物；9. 清贵州官方人物；10. 入黔滇军人物。

在同一类别中，则以地位、作用和所涉事件、地域等因素为排序参考依据。

一些人物政治立场、态度有变化，或先后分属、兼跨几个类别，则择一主要类别载入，并在其传记中写明。

三、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前，同盟会贵州分会漆运钧、张友栋、自治学社方面钟昌祚、张泽钧、李泽民、彭述文、及宪政预备会牟琳等人都曾在京加入了全国立宪派组织——辛亥俱乐部；蔡嶽、周培艺、孟昭常、方还等人加入了政务调查会；而牟琳还加入过帝国土统一党和帝国宪政实进会等。由于这些组织在贵州并未正式成立分部或分会，在辛亥贵州光复过程中亦未见以组织形式产生过作用和影响，故不单独分类编排。

至于1912年及之后，一些贵州人物分别加入了中国社会党、统一党和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等政治党派组织，这是辛亥贵州光复后之事，故亦不单独分类排列。

四、所列人物传记，着重记述其辛亥革命过程中，包括清末